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是新瓶旧酒，还是别开生面

——浅析混合战争理论的特点

■陈航辉 邓秀梅

要点提示

- 混合战争理论之所以引人关注,关键在于它体现了现代冲突的多维性,契合了信息时代战争制胜法则。
- 与以往“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作战、非正规武装在后方战场辅助配合”的作战模式不同,混合战争中,正规军与非正规武装往往在同一战斗空间内混合编组、密切协同,并且非正规武装通常作为主战力量使用,正规军却常常扮演辅助配合角色。

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冲突的复杂性、多维性和不确定性急剧增加,一些传统战争理论不再适用,复合战争、第四代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等新型战争理论不断涌现。其中,影响范围最广的是混合战争理论。与其他战争理论不同,混合战争理论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争议,部分军事专家认为混合战争理论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没有新意;也有军事专家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是混合战争。不管怎样,混合战争理论已成为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战争理论之一,得到各国军队的普遍关注。

混合战争理论从何而来

混合战争理论的发展与坦克战理论相似。发明坦克并将其投入实战的是英军,但将坦克战发挥到极致的却是德军。同样,提出混合战争理论的是美军,但目前把混合战争理论用得最好的却是俄军。

最早提出混合战争概念的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和退役美军中校弗兰克·霍夫曼。2005年11月,时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发展司令部司令的马蒂斯与弗兰克·霍夫曼在《未来战争:混合战争的兴起》一文中首次提出混合战争概念,预言未来美军面临的敌人将主要实施混合战争。这一结论,既是基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反思总结,同时也吸收了“三个街区战争”思想。“三个街区战争”理论由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该理论认为未来海军陆战队可能需要在同一个城市的3个临近街区分

别实施大规模作战、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核心思想是美军担负的任务将趋于多样化。

2006年的黎以冲突是混合战争理论发展的助推器。冲突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采用混合战术,令师承美军的以色列国防军屡屡受挫。黎以冲突结局令美军大为震动,促使美军关注混合战争带来的挑战。2007年,霍夫曼在《21世纪的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混合战争理论,引起美军高层重视。此后,混合战争、混合冲突等概念逐渐得到美军官方认可,被写入2009年版《联合作战顶层概念》、2010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15年版《美国国防战略》等重要文件。

美军认为,混合战争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它是弱势对手抵消美军技术优势的不对称性策略,因此未将混合战争理论作为美军的作战指导。真正将混合战争理论用于战场并引向纵深发展的是俄军。

2013年2月,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在《科学的价值在于预见:新挑战要求重新思考实施战斗行动的形式和方法》一文中肯定了混合战争理论的合理性,指出现代冲突更加注重运用非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格拉西莫夫将军的观点被西方国家视为俄式混合战争的理论先导。2014年以来,俄罗斯先后出兵克里米亚、乌克兰和叙利亚,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将常规战与非正规战有效结合,令西方国家措手不及,被称为“格拉西莫夫主义”的俄罗斯版混合战争理论名声大噪。俄军的最大贡献,在于证明了混合战争不仅是弱者的非对称性策略,也可成为强者的有力工具。

混合战争“混”在哪里

一般认为,混合战争是指在冲突的全频谱综合运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常规和非正规战术,达成政治目的。混合性是混合战争的基本特性,这是混合战争得名的原因所在。

国家工具混合运用。乌克兰冲突、叙利亚战争等近几场典型混合战争实践表明,军事手段是打赢混合战争的基本依托,但仅凭军事手段不足以赢得最终胜利,并且代价巨大。只有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所有国家工具,才能发挥综合制衡效应,才能赢得彻底和持久。例如,把经济手段作为牵制对手的杠杆,通过经济施压动摇对手的战斗意志;通过外交斡旋相互妥协,寻求国际社会支持,争取利益最大化,等等。

作战样式混合多样。霍夫曼认为,多种作战样式混合并用是混合战争的最大特点。为增强行动的隐蔽性和合法性,主权国家一方面在正面战场大打常规战,一方面在隐蔽战线积极扶持当地武装实施游击战、情报战等非正规战。在技术全球扩散以及外部势力支持下,非国家行为体能够获得无人机、反舰导弹、防空武器等先进装备,具备初级的诸兵种合成作战能力,如“伊斯兰国”武装能够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军正面对抗。因此,在乌克兰、叙利亚等混合战场上,呈现出激烈的高技术常规战、隐蔽的特种战、现代化游击战、高强度网络战以及大规模舆论宣传战相互交织的复杂场景。

参战力量混杂多元。混合战争中,参战力量不仅包括传统兵种和高技术兵种组成的正规军,而且包括反对派武装、部落民兵武装、雇佣军等非正规武装,甚至可能涉及恐怖组织、极端宗教武装、犯罪团伙等暴力团伙。与以往“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作战、非正规武装在后方战场辅助配合”的作战模式不同,混合战争中,正规军与非正规武装往往在同一战斗空间内混合编组、密切协同,并且非正规武装通常作为主战力量使用,正规军却常常扮演辅助配合角色。

武器装备高低混搭。混合战争中,既要应对高端威胁,又要对付低端对手;既打高技术战,又打低端非正规战;因此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门、技术含量参差不齐,呈现出尖端武器与老旧装备混搭使用的鲜明特点。叙利亚战争实践表明,新老装备混搭能够避免“用200万美元的导弹打击200美元的目标”的成本失衡,有利于提高作战效益,降低战争成本。

混合战争理论新意何在

与复合战争等战争理论相比,混合战争理论之所以引人关注,关键在于它体现了现代冲突的多维性,契合了信息时代战争制胜法则。说白了,混合性只是混合战争的象征,其有效性来源于三大本质特征。

基于效果的新总体战。混合战争理论承认现代冲突的多维性,强调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国家工具,体现了传统总体战思想,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总体战要求全民皆兵,军事处于国家战争体系的中心,其他国家工具围绕军事运转,契合了机械化战争“大规模、高消耗”的特征。混合战争理论打破了以军事为中心的战争范式,强调优先使用非军事手段,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少战而屈人之兵”。即便使用军事力量,也倾向于四两拨千斤,折射出信息时代“灵巧制衡、精确释能”的战争法则。

由内而外的瓦解战。传统战争犹如“掰弯心菜”,层层击溃敌国常规军事力量后,迫使敌国执政当局宣布投降并割地赔款。混合战争的打法就像“切洋葱”,预先在敌国境内扶持反对派,建立“第五纵队”,时机成熟时提供装备、训练与作战指导,并通过信息动员丑化敌国执政当局特别是敌国家安全部门,在无须消灭敌国军队的情况下,推翻敌国执政当局,控制敌国政权与经济命脉。与传统战争相比,混合战争的手法更加隐蔽、经济和高效。

攻心夺志的认知战。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通过野蛮杀戮震慑驯服的策略已无法奏效,只有赢得观念上认同,才能达成持久战果。因此,混合

战争理论注重运用信息手段塑造舆论,引导民意,主导认知域。一方面,利用传统媒体、网络新媒体等全媒体手段,针对冲突区民众和国际社会实施大容量、多渠道战略传播,借助各类代言组织或公知主动发声,获得目标受众的理解、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揭露真相、制造假象、散布假信息等方式,与敌方开展高强度信息对抗,并巧用法律武器与敌进行法理斗争,迷惑敌方心理,软化对抗意志,使敌举棋不定、难以决策。

混合战争理论走向何方

尽管一直饱受争议,美国军方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但混合战争理论在利比亚、克里米亚、叙利亚等地已被证实。实践证明,混合战争理论正日益受到各国军队的重视。

混合战争理论将为大国对抗提供理论指导。混合战争理论强调优先使用非军事手段,能够跨越核门槛的限制,为大国对抗注入新选项。目前,俄军已将混合战争作为应对西方混合威胁的主要途径,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式混合战争模式。美军也在吸收混合战争理论的精华,如美军多域战概念关于“竞争—武装冲突—回到竞争”的概念框架体现了混合战争谋势造势、平战一体的思想。此外,美军正在制定“特洛伊木马”新战略,核心思想是通过秘密渗透和扶持“第五纵队”瓦解对手,与混合战争的瓦解战思想如出一辙。

混合战争理论将由战略思想层面加速向战役战术层面发展。当前,各国军队对混合战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思想和观念层面,尚未形成系统的、可操作的作战理论,甚至对混合战争的概念和作用依然存在较大争议。展望未来,“混合冲突可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混合战争理论将大有用武之地。随着战争实践不断丰富,必将推动混合战争理论向战役甚至战术层次发展,促使混合战争理论真正落地,催生切实管用的技术、战术和程序。

对抗演习不应忽视「绿方」

■陈玉飞

群策集

●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绿方”,无疑会影响作战进程,有时甚至会左右作战胜负。

说到对抗演习中的“蓝方”,大家并不陌生。但谈起“红方”和“蓝方”之外的“绿方”,估计会有很多人会感到陌生。

从中外演习实践来看,“绿方”泛指各类对抗演习中有别于“红方”“蓝方”的第三方力量,既可能是中立方,也可能是暂时还未表明立场,但随时可能加入某一方的政治派别或武装力量。

之所以要在对抗演习中构造“绿方”,是因为实战中“绿方”无处不在。往大了说,战争敌对双方以外的中立国、其他可能参战国是“绿方”;往小了说,作战地域内保持中立态度的政治派别,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立场难辨的当地居民也是“绿方”。这些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绿方”,无疑会影响作战进程,有的甚至会左右作战胜负。特别是随着新时代我军使命任务的拓展,军队将更多地遂行跨境控制、国际维和、维护海外利益等任务。这种背景下,我军官兵在境外与这些大大小小的“绿方”力量进行对抗与合作的概率将大为增加。为了使对抗演习最大限度地贴近实战,当然少不了举足轻重的“绿方”。

事实上,提升官兵正确应对“绿方”的能力绝非易事。电影《美国狙击手》中有这样一幕:在伊拉克执行任务的美军狙击手,在狙击阵位发现一个当地男孩在一个妇女的指使下,上衣裹着手榴弹,向美军巡逻队跑去。50米、40米、30米……狙击手一直在等待时机,直至确认男孩即将投降时,根据交战规则射杀了男孩以及拾起手榴弹继续攻击的妇女。电影是艺术作品,在故事选取、宣传立场上必然有一定倾向。抛开这些不说,孤立地分析这个例子,男孩和妇女在发动攻击前,是中立的平民,是“绿方”;当他们准备或实施攻击后,就变成了战场上的对手,这种情况在目前的战争条件下具有一定普遍性。如果在平时演习中很少设置类似的“绿方”,很少在敌我难辨的背景下反复组织训练,官兵将难以适应未来瞬息万变的复杂战场。

近年来,我军各级对抗演习中的“蓝军”更趋形神兼备。但不可否认,演习中的“绿方”构造仍显不足,很多时候作战力量非“红”即“蓝”,非我即敌,这显然与未来作战可能遇到的情况不完全相符。下一步,可采用专家团队担任、专业部队扮演、人工智能模拟等方式,在对抗演习中构造“绿方”,开展“红”“蓝”“绿”博弈与对抗背景下的实战化演练。具体来说,可在战略战役对抗演习中,增设利益攸关国等“绿方”力量,以提升中高级指挥员运筹帷幄、争取友好力量、协调联军作战等能力;在战术对抗演习中,增设预定作战地域不同派别武装力量、当地平民等“绿方”力量,以提升官兵识别判断敌情、把握作战限制、运用交战规则等能力。

研战读史要善疑

■吴敬文

挑灯看剑

在粟裕大将的指挥生涯里,有一个精算歼敌7000多残兵的故事,发生在孟良崮战役时。有的记者片面强调指挥员的精算之功;粟裕将各部队上报的歼敌数字与敌第七十四师的编制数一对比,发现少了7000多人。

然而,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据《粟裕传》记载,孟良崮战役接近尾声,参战部队开始打扫战场,收拢部队。这时华野情报处向粟裕报告:技术侦察发现,作战区域内还有敌人在发电报联络救援。这一情况立即引

起粟裕的高度重视。他命令部队认真查对歼敌人数,仔细搜查隐蔽的山沟。最后,发现在孟良崮与雕窝之间的山沟里集结有7000多敌人准备突围。粟裕当机立断,调集部队将其包围全歼。

很显然,技术侦察发现的敌人求援电报,是引起粟裕重视的重要因素。粟裕是我军著名的常胜将军,但常胜将军也是人不是神,承认技术侦察的作用并不降低大家对粟裕指挥才能的评价。全歼敌第七十四师之后,参与指挥的陈毅元帅,紧紧握着粟裕的手,激动地说:“老伙计,这个仗,你硬是越打越神了。”

著名军事家约米尼曾说,军事理论研究唯一可靠的依据是战例研究。但是,战例展示的永远是过去的战争,具有滞后性;战例所展示的事实,仅是战例记者眼中的一个侧面,具有片面性;战例所展示的结论,来自战例撰写者的总结,具有主观性。

所以,研究战例应抱有批判和挑剔的眼光,敢于质疑和设问,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例中穿透时空的迷雾,看清事实的本质。怎样质疑和设问呢?应把握几个基本要点:一是权威著作的可信度高于单篇论文或者个人回忆录;二是应对一个事件从多个资料来源进行对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三是要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综合思考的能动性;进行鉴别和判定;四是在各种资料都不支持自己既有结论的时候,应及时纠正思维偏差。

在战争形态发生质变的时代,技术和装备在不断进步,战场面貌日新月异,军事研究必须瞄准未来的战争,在总结好已有战争经验的基础上设计未来战争,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预测、设计、验证未来战争。不仅不能拘泥于过去的战史战例和战争经验,而且不能盲目采信他人的研究结论;应该依据自身实际和作战需要,创新作战理论和作战方法,方可取得作战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

联合指挥训练不能偏了方向

■刘孝良 李美丽

观点争鸣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是颠扑不破的训练铁律。联合作战指挥训练也必须瞄准战场实际,演练指挥打仗之策,研战战争制胜之法。不论是战法创新,还是行动控制,不论是联动作业,还是信息系统运用,都不能偏离了实战这个根本要求。

战法前瞻不可脱离实际。战法研究、谋略创新是联合作战指挥训练的核心和关键,直接决定联合作战指挥训练的质量和效益。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场完全相同的战争。战法研究应当而且必须前瞻设计,解决未来“打什么仗”“如何打仗”的问题。但战法前瞻从来都不是天马行空、不切实际地异想天开,而应着眼战略形势可能变化、作战能力可能发展和作战对手实际情况来设计、来构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战法前瞻如果脱离实际,就可能出现“为奇而新”“为奇而新”的做法,不仅指导不了未来作战,也牵引不了部队训练。要知道,战法过度前瞻或者过于保守,都偏离了能打胜仗这个根本,应该把战法设计的立足点放在现有装备上,着眼武器装备可能发展,把现实与可能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以“正合”以“奇胜”。

纵观全局切记抓住关键。统揽全局、抓住关键,是实施联合作战指挥的基本要求,也是联合作战指挥训练的重要内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谋全局、控全局,已经成为联合作战指挥的普遍共识。但如何打破军种“壁垒”,融合形成体系之力?如何拆除军种“藩篱”,聚合形成指挥合力?实践中,有的同志喊着统观全局的口号,全盘“下放”指挥权,把联合指挥等同于军种指挥之“和”;有的打着精确指挥的旗号,“一竿子”捅到底,把联合指挥简化成战斗指挥。对此,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曾指出:“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主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的。”面对纷繁复杂的战场态势,联合作战指挥员如何抓关键,做到善观敌情变化,深入分析敌之意图,研判其可能行动;善察我情状况,深入分析我之作战能力,研判我遂行任务潜力;善析环境演变,深入分析战场环境之利弊,研判对我行动之影响。在此基础上,站在联合作战之全局,找出当前影响任务完成之关键行动、关键方向、关键力量,围绕这个关键协调作战行动、调控作战资源,通过一个又一个关键任务的完成,把联合作战导向胜利。

基于信息系统练好指挥。信息时代,网络信息体系是打赢现代战争的核心支撑。指挥信息系统,是网络信息体系的关键支点,也是指挥员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组织开展基于信息系统的对抗训练成为世界各国军队的普遍做法。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军中央司令部组织各级指挥员、参谋和技术保障人员,在前线临时指挥部进行了代号为“内窥03”的军事演习,反复推演检验和完善决策方案,保证了美军在战场上能够有条不紊地展开军事行动。然而,所有信息系统都是人设计的,都不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作战客观实际,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和缺陷。基于信息系统练指挥,就不能仅盯着输赢,把功夫花在找“空子”上。面对日益迫切的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生成需求,基于指挥信息系统对抗训练应该牢牢把握指挥打仗这个根本要求,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发挥信息系统功能上,快速察情、快速谋划、快速决断、快速调控,以快制胜;把运用的焦点放在力量联合上,优化指挥关系、再造信息流程、重塑作战体系,真正实现在恰当时间、恰当地点,用恰当的系统,把恰当的信息给恰当的人;把训练的难点放在施训用谋上,研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战法招法,回答和解决好未来打仗如何破敌体系、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夺战资源,通过一个又一个关键任务的完成,把联合作战导向胜利。